

傳統文化與實用理性的雙重解構

——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癡狂敘事

◎ 黃曉華

作為一種「佚智失理」的異常情態，癡狂自文明伊始，就引起醫學家與思想家的關注。在任何時代，人們都將無法被大眾理解與接受的言行視為「癡狂」。中國古代寓言「狂泉」很早就觸及到癡狂的這種荒謬性。這種屬於個體的癡狂與屬於社會的常態之間的對立，決定癡狂具有反公共理性——不能為大眾理解與反社會文明——不能為大眾接受的雙重特性。這一雙重特性賦予癡狂以一種含混而豐富的意義空間。這種在思想上的開闊性在文學創作中表現為敘事的多重可能性。癡狂敘事造成了「一個不可彌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對自己提出質疑」，從而使世界「承擔起從非理性中恢復理性、再把理性交還給非理性的任務」。¹

中國古代有著豐富的癡狂敘事傳統。從《論語·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輿到《莊子·人間世》中的楚狂接輿，從《世說新語·任誕》中與豬同飲的阮氏族人到《紅樓夢》中「有時似傻如狂」的賈寶玉，從民間傳說中的「濟顛」（濟公和尚）到現實中的「張顛」（張旭）、「米顛」（米芾），癡狂敘事為超穩定的傳統文化增添了一絲異類色彩，也為傳統文化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然而，由於傳統文化中的「互補辯論法」的「重點在揭示對立項雙方的補充、滲透和運動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統的動態平衡和相對穩定，而不在強調概念或事物的鬥爭成毀或不可相容」，²癡狂因此被納入「理」的範疇，孔子的「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³成為經典論述，癡狂只是作為「理」的一種附屬的補充與點綴而存在，並未對傳統文化以及理性形成正面挑戰。這種癡狂敘事在西方文學的衝擊下，獲得一種全新的品質。清末民初的大變局，使人逐漸意識到傳統文化以及實用理性的局限，由此逐漸形成一股徹底反傳統的思潮，癡狂敘事在這時獲得一種全新的品質。1903年，匪石的〈元〉將癡、瘋、癡、狂視為「思想極到」⁴的表現。1908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盛讚負「狂人」之名的「精神界之戰士」⁵雪萊。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真正開啟現代癡狂敘事的大幕。這一敘事形式從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了傳統文化與實用理性，表現出一種鮮明的現代品質，從而與傳統的癡狂敘事形成一種斷裂。中國現代作家通過癡狂中包含的社會一個人的尖銳對立，反觀傳統文化與實用理性。他們以一種人文知識份子的責任心，「不停地對設定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⁶使人們對「正常」發出深刻的質疑，從而實現對傳統文化與實用理性的雙重解構。癡狂敘事所蘊含的多重意味也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注意。魯迅的〈狂人日記〉一直都是眾多研究者關注的重心之一。1990年，新加坡學者王潤華從類型學的角度對五四小說中的「狂」與「死」進行了具體分析，並簡要區分了「狂」的兩種類型：一類是被大眾視為瘋子，另一類則是被逼成瘋子。這種區分實際上指向了癡狂的兩個向度。然而，王潤華雖然點出了「狂」的悲劇意味及其現實意義：「對中國文化之反思，對舊傳統之攻擊，對理想未來之彷徨」；⁷但全文重心還是史料的梳

理，未曾具體展開理論分析。王志禎的〈論路翎小說主人公的「瘋狂」〉（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與黃曉華的〈常態與癡狂的價值錯位——從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看沈從文的深層意識結構〉（載《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1期）等論文則從單個作家切入，未曾對現代文學癡狂敘事形成一種整體觀照。而從整體上把握現代文學的癡狂敘事，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癡狂敘事所具有的現代特徵，挖掘其多重內涵。

一、傳統文化的解構

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啟現代癡狂敘事的大幕。這個狂人一方面秉承摩羅精神，帶來尼采超人的吶喊，明顯有著與庸眾對立的「佯狂」性質；另一方面則表現出「迫害狂」的深層心理。這一「佯狂」與「真狂」的雙重性，使得這一小說成為眾多研究者論爭的中心，由此也凸顯出癡狂敘事意蘊的複雜性。從病理學上講，「狂人」的確有著「迫害狂」的症狀。然而，哪怕是在「真」狂的狀態中，依舊有著潛在的邏輯，「吃人」是一種歷史現實，而「狂人」之所以被視為「狂」，只不過因為他意識到危險的存在：「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而所謂「正常」，則是對這一危機視而不見。他將人們熟視無睹並默認為「正常」的「吃人」無數倍地放大，並且以「迫害狂」的姿態主動承擔起災難的命運，然而這種主動的承擔卻正是一種「病態」的「狂想」。因此，文化上的清醒成為病理學上的病態，而病理學上的正常卻不過是認同自己不會被吃的生存謊言的結果。作者通過揭示文化常態與文化癡狂以及病理常態與病理癡狂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揭示文化的荒謬本質，直斥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本質上就是「吃人」的歷史，從而從根本上解構了傳統文化的合理性。四川反孔鬥士吳虞的〈吃人與禮教〉（載《新青年》第6卷第6號）用詳盡的資料為〈狂人日記〉做出注解。

更多的作家則同樣選擇癡狂敘事繼續魯迅文化解構的創作意圖，使得五四出現了一股「狂人熱」。署名K.S的〈狂人話〉可以明顯看出與〈狂人日記〉的血緣關係：「惡狗村」與「趙家的狗」，「殺人的地方」與「吃人」，「極樂園」與「將來的人」，「小孩子」的「很厲害的眼睛」與「小孩子」的鐵青的臉……這位狂人以自己的美夢對抗「沉寂、淒慘、可怨、而又黑暗」⁸的夜的侵襲，以瘋狂否定麻木。周作人〈真的瘋人日記〉則將矛頭直指當時的文化現實，以假託的「德謨德斯坡諦恩」影射當時的中國，對當時文化界的種種荒唐可笑之事極盡諷刺之能事。這個「世界上最古，而且是，最好的國」裏，「各人的祖先差不多都曾經做過一任皇帝」，每個「平民」因此都是「便衣的皇帝」，⁹都試圖行使皇帝的權威，鮮明地刻畫出當時某些古國國民的心態。而以「滿蘊著溫柔，微帶著憂愁，欲語又停留」的風格著稱的冰心，五四時期也創作出晦澀的〈瘋人筆記〉。這篇猶如夢囈的作品，講述的不過是一個極為簡單的故事：一位在人世間補了五十萬年鞋子的「瘋人」感悟到，失去愛也就意味著失去生機與生命。小說中「白的他」與「黑的他」，不僅在社會層面形成一種對立，王子——乞丐，高貴——卑微；而且在個體層面象徵另一種對立，愛——恨，靈——肉，超我——本我。但他們在這個聰明人佔據的塵世上都難以生存，「『黑的他』是被你們逼死的，『白的他』是被你們逼走的」。¹⁰而瘋人自己，也在這五十萬年亙古不變的塵世間，為抗拒世人的同化而陷入絕對的孤獨。這種「愛」的缺乏，潛含著冰心對傳統文化致命缺陷的認知。

這些癡狂敘事從不同的角度繼承並補充了〈狂人日記〉解構傳統文化的本質的意圖。而魯迅〈狂人日記〉的姐妹篇〈長明燈〉則由解構傳統文化的本質轉向解構傳統文化的運行機制，從另一角度展現傳統文化的荒謬性。〈狂人日記〉通過狂人的內省視角宣告了傳統文化的

「吃人」本質，〈長明燈〉則通過瘋子的外在境遇展示傳統文化「如何吃人」的過程。在〈長明燈〉中，魯迅通過各種話語權力對「瘋子」進行的「缺席判決」，深刻揭示了傳統文化運行機制的殘暴與荒謬。小說中相信「那燈一滅，這裏就要變海，我們都要變泥鰍」¹¹的民眾明顯比「瘋子」更為荒誕不經，然而「我們」作為話語權力的擁有者，通過將其缺席界定為「瘋子」，也就消解了他言說的權力與意義。「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¹²如果說民眾的信仰雖然愚昧但還有著某種真誠的話，那麼，在受實用理性支配的紳士階層那裏，就只有利益。在這一文化體制中，紳士為了霸佔「瘋子」的財產，庸眾則為了維護虛幻的「信仰」，實現了某種共謀，共同完成對「瘋子」的審判。然而，在這一審判過程中，「瘋子」始終表現為雙重缺席：實體的缺席與意願的缺席，他的個體意志始終被忽略不計。「瘋」的判決取消了思想與言說的合理性，同時取消了個體意志的有效性，從而使四爺可以任意闡釋「他者」的意志。為了侵佔「瘋子」的房產，他以「香火」的美名，將遙遙無期的六順的第二個兒子過繼給「瘋子」。「瘋子」因無法承繼香火而被忽略不計。通過「瘋子」的命運，魯迅不僅揭示了傳統文化的「吃人」機制：以「理」殺人；而且揭示了傳統文化的內在矛盾：紳士與庸眾對「理」的理解貌合神離。當庸眾愚昧而真誠地信仰傳統的時候，紳士則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民眾與傳統。通過將各種權力迫害「瘋子」的場景推上前台，魯迅不動聲色地將傳統文化中的荒唐可笑演示給人看，從而從根本上消解了傳統文化的內在合理性。

二、實用理性的顛覆

魯迅等人通過癡狂敘事指向了傳統文化的殘暴與荒謬。正是這種殘暴而荒謬的文化導致了社會的停滯與人格的萎縮。因此，傅斯年在〈一段瘋話〉中迅速對「狂人」作出反應，「中國現在的世界，真是沉悶寂滅到極點了；其原因確是瘋子太少。瘋子能改換社會，非瘋子頭腦太清楚了，心裏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隨著社會的潮流，滾來滾去」，因此呼籲「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¹³這裏，傅斯年實際上注意到癡狂與人格之間的關係。實用理性與儒家文化的合流導致了整個民族人格萎縮。「中國文化的等級機制和道德理性的嚴密控制，使中國人的生命力在人格化方面趨於無限萎縮，這使整個民族的生命態失去了蓬勃的活力和創造力，因而它也就必然造成人格、意志和道德意識的全面萎縮。」¹⁴孔顏的安貧樂道蛻變成阿Q的精神勝利，禮教的道德規範蛻變成四爺的惟利是圖。實用理性成為生活的主宰。偶爾有一二敢於打破這種常規的人，也必被他們視為「瘋子」。
〈藥〉中的夏瑜因挨打後還可憐阿義的甘於做奴才而被眾人視為「發了瘋」。傳統的庸俗實用人格正需要這種癡狂來衝擊、解構。現代作家中的一部分作家，敏銳地捕捉到這一主題，利用癡狂敘事從不同角度解構傳統實用理性，力圖實現民族人格的重建。

1920年，郭沫若的〈湘累〉重塑了屈原形象，這位言語「瘋癲識倒」「精神太錯亂了」的狂人，將怒火投向這個「見了鳳凰要說是雞，見了麒麟要說是驢馬」¹⁵的濁世，力圖在創造中實現生命的飛揚，唱出了一曲生命力的狂歌。「狂飆」運動的主將高長虹則更為鮮明地張起「狂人」之旗。「庸人於其所不和，則謂之狂，你們真是庸人呵！我最大的希求，便是遠離你們而達於狂人之勝境。」¹⁶這種狂放人格與庸俗實用人格形成鮮明的對立。凌叔華寫於1928年的〈瘋了的詩人〉則塑造了一種狂逸人格。主人公回家看望病中的妻子，卻和妻子一起染上了「瘋病」，在後花園與小狗交朋友，與小貓賞明月，養育蝴蝶來美化生活。儘管世人歎息他們發瘋了，而他們卻悠然自得，以回歸自然的童心、真心來對抗人世間的冷眼、白

眼。無論狂放人格還是狂逸人格，都是對傳統實用理性與庸俗人格的一種有力解構。力圖成為「人性的治療者」¹⁷的沈從文更是明確地將矛頭指向這種「闖寺性」人格。在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下，整個漢民族的生命力都日漸萎縮，傳統實用理性與西方工具理性的合流，更造成了美與愛的極度貧乏。沈從文敏銳地看到這一病態，力圖建立一種「美與愛的新的宗教」¹⁸以改造國民性。而這種新宗教在世人眼中，卻是一種「癡癲」：「若有人超出習慣的心與眼，對於美特具敏感，即自然被這個多數人目為『癡漢』。若與多數人庸俗利害觀念相衝突，且成為瘋狂，為惡徒，為叛逆。」¹⁹對世俗實用理性的懷疑與批判，使他自然而然地弘揚作為理智對立面的「癡狂」。這種常態與癡狂之間的價值錯位，成為他的深層意識結構的核心。

在沈從文的早期作品中，〈老實人〉中的自寬君就因個性特異而被世人當成瘋子，這一命運潛含著沈從文對世俗觀念的批判。而〈山鬼〉則直接以追求自然適意的審美生活的「癡子」為主人公。這位在日常生活中和正常人並沒有什麼兩樣的人之所以被視為癡子，只不過因為管理地方一切的「神同人，對於癡子可還沒能行使其權威」，²⁰他總「比常人要任性一點，要天真一點」²¹，有著無端而來的哀樂，以及一些「奇怪」的愛好：他「不吃煙，又沒同人賭過錢」，²²而為了看桃花與好看的牛以及木人戲等美的事務，他卻總是不辭勞苦。這種審美人格由於動搖了現實生活的兩大支柱——權威與慣例——而成為不安定因素，以至於被眾人視為「癡子」。而這種審美人格實際上更為接近人性的本來，癡子因此在童心世界中如魚得水，成為「代狗王」。²³這種癡狂敘事隱含著沈從文對出世人眼中「常態」的批判。而在沈從文對同一故事的三次不同敘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癡狂與常態在沈從文心目中的價值錯位。

「商會長年紀極輕的女兒，得病死去埋葬後，當夜被賣豆腐的年輕男子從墳墓中挖出，背到山洞中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墳墓去。到後來這事為人發覺時，這打豆腐的男子，便押解到我們的衙門來，隨即就地正法了。」²⁴這一事件在他1930.8.24創作的〈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以下簡稱〈三〉）、1931.4.24的〈醫生〉及1931.8的〈清鄉所見〉中重複出現。從對這一故事的不同講述，可能清楚地看出沈從文對「癡」與「常」的社會評判與實際價值之間的錯位的反思。在〈三〉中，沈從文通過對故事的改造，使其「離去猥褻轉成神奇」，²⁵也由於當地的文化寬容，青年並沒有被人稱為「癡子」。到了〈醫生〉中，相信「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過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以重新復活」²⁶的青年在「理智」的醫生眼中則變成了「瘋子」。而在〈清鄉所見〉中，沈從文直接表明了自己對「癡子」的價值判斷，他不僅從外表上認為「癡子」「毫不糊塗」，²⁷而且對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深表同情，補充了「癡子」沉默背後的話語，而這也正是代表了作者的心聲：「不知道是誰是癡子。」²⁸在信奉愛與美的「癡」與代表現實功利、唯利是圖、人云亦云的「常」之間，沈從文自覺選擇了與「癡」的價值認同，從而使他的價值體系與世俗的價值體系之間形成某種錯位與對立。他清楚地意識到：「追究生命『意義』時，即不可免與一切習慣秩序衝突」²⁹這樣的行動可能「被人當作瘋子，或被人殺頭」³⁰。但是這又是一個人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命，把握自己生存的意義的唯一方式。正是在這一癡狂——常態的價值錯位中，他找到了一些顛覆實用理性的因數。³¹

三、社會認同的拷問

癲狂不僅表現為個體與社會的外在衝突，更表現為個體與社會的內在衝突。當個體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處於極端的衝突狀態時，這種人格分裂也就導致癲狂。這種癲狂敘事更深刻地揭示出傳統文化以及實用理性對個體生存的制約與影響。一旦它們深入到個體的內心，也就成為一種強大的異化力量，左右人們的自我認同，並製造種種人間慘劇。魯迅〈白光〉中的陳士成，將獲得社會認同當成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標，落榜之後，官當不成了，便做著發財的美夢，想躺在祖宗留下的家產上重新出人頭地。當這種可能性破滅後，他也就只剩下發瘋一條路可走。他的瘋狂打著傳統名利思想的深刻烙印。許欽文〈瘋婦〉中的媳婦變瘋的導火索是洗米時丟了鰲頭與米籬，但其深層原因則是婆婆試圖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的傳統觀念以及物重於人的實用思想。賽先艾〈鄉間的悲劇〉中的祁大娘被丈夫遺棄後精神失常，跳井自盡，她的瘋狂折射出傳統女性依附觀念的深遠影響。台靜農〈新墳〉中的四太太經歷了女兒被強姦、兒子被殺害等人間慘劇，但使她變瘋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受實用理性支配的族人，她在家產被族人騙走成為瘋子。沙汀〈獸道〉中的魏老婆子，她媳婦產後尚未出月便被一群大兵輪奸後上吊自殺，但她並沒有因此馬上絕望，然而親家母的哭鬧、世人的侮辱，以及初生的孫兒的歸西，終於使她變瘋。在這些癲狂敘事中，不僅有著對社會制度的抗議，更有著對產生這種病態社會的傳統文化與實用理性的抗議，癲狂是對這個腐朽社會最強烈的控訴。張愛玲與路翎等則將焦點放在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癲狂中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無法調和的衝突，由此更深刻地揭示現代生存意識與傳統文化與實用理性之間的深層矛盾。當社會認同作為一種極端的公共理性左右個體生存時，它也就成為一種使人異化的異己力量，癲狂正是這種異化的具體表現。

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同樣是傳統的社會認同的犧牲品。這位在張愛玲自己眼中都是唯一的「極端病態」與徹底「瘋狂」³²的人物，原本同樣有著正常人的欲望與人生理想。在小說最後，她還是流出了一滴人性的眼淚，想到自己以前交往的普通男人，「如果她挑中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往後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³³。但當她被父母的包辦婚姻送進姜府，成為患有骨癆的姜二爺的妻子後，她就被傳統觀念推動著，一步一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³⁴。在這個充滿各種明爭暗鬥的封建家族中，當正常的欲望無法得到滿足時，她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抓住自己能夠抓住的一切，最終成為黃金的奴隸，披上黃金的枷鎖。她以為把握了金錢也就把握了世界，而這種極端的異化觀念，這不僅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親人。「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³⁵曹七巧成為瘋子，展現了社會意識對人的強大的異化力量以及時代的沉重。

「有一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³⁶的曹七巧的內心世界，終究因徹底異化而顯得和諧。而被視為「靈魂奧秘的探索者」³⁷的路翎則以濃厚鋪張的筆觸，寫出了癲狂所展現的個體認同與社會認同的尖銳衝突。〈英雄的舞蹈〉中的張小賴在充滿著「非常古舊的英雄的氣氛」的小鎮上說了十幾年書，在茶館裏生動地演繹著古代的英雄們的事蹟，培育並維持古鎮的英雄氣氛；但是這種英雄氣氛卻故不過「傷風敗俗」的「何日君再來」，他的英雄傳奇不再能挽留顧客，他由此而「憤怒、歡笑而發狂，和這個失望做著殊死的搏鬥」，³⁸如唐吉訶德一般和假想的巨人搏鬥，最後在瘋狂狀態中死在台上。他的瘋狂與死亡正體現出他尋求社會認同的全面敗北。在《財主底兒女們》中，路翎更以他濃墨重彩的油畫風格描述了另一個始終處於內心激烈衝突中的瘋子——蔣蔚祖。

1945年《財主底兒女們》上卷出版。這部曾被譽為「現代中國的百科全書」的巨著，細緻而真實地刻畫了蔣蔚祖瘋狂的過程。正如馮雪峰所言，「瘋子發瘋的唯一理由，是以他自己的真實，恰恰碰撞著社會的真實。」⁴⁰當個體的本真需求與社會的異化力量難以調和時，瘋狂也就成為一種必然。這種折射人類生存困境的精神狀態的產生與成長必然「和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人生糾結得深」，從而使「整個現在中國歷史能夠顫動在這部史詩所創造的世界裏面」。⁴¹《財》中的蔣蔚祖作為一個富足家族中受著父親寵愛的長子，不用擔心物質貧困，傳統文化的根基使他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挖掘出詩意，順天安命的性格使他有一種自得其樂的平和，他似乎具備了一切使幸福成為可能的條件。這種擺脫生存壓力後的瘋狂更深刻地反映了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尖銳衝突。

無可否認，蔣蔚祖瘋狂的根本原因是其獨立意志的缺失所導致的不成熟狀態，以至在眾人眼中「好像蔣蔚祖是小孩子」。⁴²然而，這種獨立意志的缺失正是傳統父權的結果。他唯有取消自己的獨立意志順應父權，才有可能獲得和平與安全。妻子的出現使他意識到愛情這種更為本真的需要，從而使他開始反抗父權。然而，獨立意志的缺失使得他無法承擔任何一種選擇所產生的責任，當他試圖倒向愛情的懷抱中時，親情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而導他試圖與親情和解時，愛情又促使他逃離。他於是只能不停地在二者之間奔走逃亡，陷入一種精神分裂。但這種意志發展的滯後並不必然導致瘋癲。他的發瘋，更主要的還是他淪為一種工具性存在，成為父親與妻子之間爭奪的戰利品。在這裏親情是扭曲了親情，愛情是扭曲了愛情。父親試圖利用父權將兒子束縛在自己的膝下，並且不惜以禁閉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而妻子更是為了赤裸裸的物質利益利用他的愛情。在其他的人際關係中，這種異化更為嚴重。在蔣蔚祖的周圍，並沒有他所渴求的真正的理解與愛，有的只是用溫情掩蓋的物質利益的爭奪。姊妹與妻子為了財產，在父親屍骨未寒時，以愛情或親情的名義迫使他們有利於自己的表態，為此不惜給他致命的一擊。在這種赤裸裸的實用理性的支配下，人作為主體的意義消弭無形，異化為一種工具性存在。當蔣蔚祖無力順應這些社會認同中的任何一種時，他也就只剩瘋狂一條道路可走。然而，蔣蔚祖也正是以瘋狂洞穿著這個世界的虛偽與醜態，在癲狂中無所顧忌地批判這個不將人當成人的人的社會，否定了現存的理性與道德。正是在瘋狂中，蔣蔚祖以自己的本真對抗世界的異化，以情感否定著工具理性與社會認同。路翎以一個靈魂的拷問者的姿態，不僅批判蔣蔚祖的軟弱，而且批判了使他瘋狂的病態社會。雖然蔣蔚祖的瘋狂與自殺並未指示出前進的方向，但他的瘋狂與自殺本身就出於對生存意義的嚴肅思考。「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人值得生存與否，就是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⁴³在整個生存的荒誕處境中，瘋狂與自殺一方面說明了生存的失敗，另一方面則彰顯著生存的意義與激情。

癲狂作為一種邊緣生存狀態，始終意味著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調和失敗。正是在這種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尖銳衝突中，折射出文化與理性對個體生存的影響，折射出人類的認同困境。這一敘事方式甚至在革命話語中也曾經曇花一現。草明〈瘋子同志〉寫了兩個瘋了的革命者，儘管草明的目的是為了凸顯出他們瘋了也不忘革命的精神，李慕梅「神經錯亂的腦筋裏，永遠記得革命，女人，小孩三件事」⁴⁴，但她因女兒死去而變瘋的結果，正凸顯革命信念的局限，它並不能完全解決個體的認同危機。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癲狂敘事，正是從個體的生存境遇出發，從不同的角度對文化與理性進行著雙重解構，拓展了現代文學的視野，深化了現代文學的主題。它一面繼承了傳統癲狂敘事「特立獨行」的審美特性，另一方面吸取了西方文學中癲狂敘事的某些現代品質，如對人物深層病態心理的挖掘；全新的價值觀念等。然而，四十年代中後期，人物思想的複雜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視，癲狂更是由於其涉及人物無意

識以至病態心理而被排斥。正是從這種受忽視的命運可以看出歷史的浮躁，人們滿足於浮光掠影的宣傳，而惶恐於鞭辟入裏的剖析，追求簡單的明朗，而畏懼深晦的豐富。四十年代後期以及解放後對胡風路翎的極不公正的批判就可以看出人們的不安。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不安表現出現代文學對現代性的拒絕。

註釋

- 1 [法]蜜雪兒·福柯 (Michel Foucault)，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269。
- 2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上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308。
- 3 《論語正義》，第294頁，《諸子集成（第1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
- 4 匪石：〈元〉，《浙江潮》1903年第8期。
- 5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87。
- 6 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47。
- 7 王潤華：〈五四小說人物的「狂」和「死」與反傳統主題〉，《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
- 8 K.S.：〈狂人話〉，《民國時報·覺悟》，1922年3月2日。
- 9 周作人：〈真的瘋人日記〉，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中國氣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201。
- 10 冰心：〈瘋人筆記〉，《冰心全集》（第1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頁410。
- 11 魯迅：〈長明燈〉，《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61。
- 12 魯迅：〈補白〉，《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11。
- 13 孟真（傅斯年）：〈一段瘋話〉，《新潮》，第1卷第4號。
- 14 徐麟：《魯迅中期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56。
- 15 郭沫若：〈湘累〉，《百年中國文學經典》（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465。
- 16 高長虹：〈精神的宣言〉，《高長虹文集》（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
- 17 沈從文：〈給某教授〉，《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195。
- 18 沈從文：〈美與愛〉，《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62。
- 19 沈從文：〈美與愛〉，《沈從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60—361。
- 20 沈從文：〈山鬼〉，《沈從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45。
- 21 沈從文：〈山鬼〉，《沈從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43。
- 22 沈從文：〈山鬼〉，《沈從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44。
- 23 沈從文：〈山鬼〉，《沈從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45。
- 24 沈從文：〈清鄉所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304頁。
- 25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4。
- 26 沈從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3。
- 27 沈從文：〈清鄉所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04。

- 28 沈從文：〈清鄉所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05。
- 29 沈從文：〈生命〉，《沈從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42。
- 30 沈從文：〈長庚〉，《沈從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37。
- 31 參看黃曉華〈常態與癡狂的價值錯位——從一個故事的三種講法看沈從文的深層意識結構〉，載《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1期。
- 32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張愛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173。
- 33 張愛玲：〈金鎖記〉，《張愛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124。
- 34 張愛玲：〈金鎖記〉，《張愛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122。
- 35 張愛玲：〈金鎖記〉，《張愛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124。
- 36 張愛玲：〈金鎖記〉，《張愛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頁122。
- 37 楊義：〈路翎——靈魂奧秘的探索者〉，《文學評論》，1983年第5期。
- 38 路翎：〈英雄的舞蹈〉，《百年中國文學經典》（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400。
- 39 〈財主底兒女們（廣告選登）〉，張環等編：《路翎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頁74。
- 40 馮雪峰：〈發瘋〉，《雪峰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127。
- 41 胡風：〈青春的詩〉，《胡風選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184。
- 42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上卷），《路翎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頁73。
- 43 [法]加繆（A.Comus），郭宏安譯：《西緒福斯神話》，《加繆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頁624。
- 44 草明：〈瘋子同志〉，《解放日報》1942年6月12日。

黃曉華 湖北大學中文系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十期 2008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十期（2008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